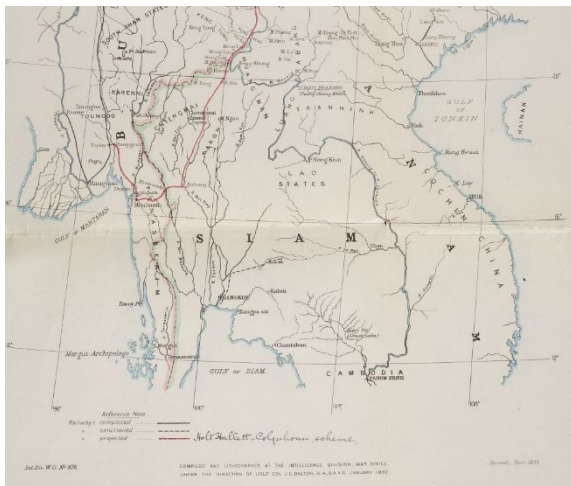


中国与现代社会@英国利兹大学: Jonathan Saha 的研究案例



印度事务部档案中的中国：三个案例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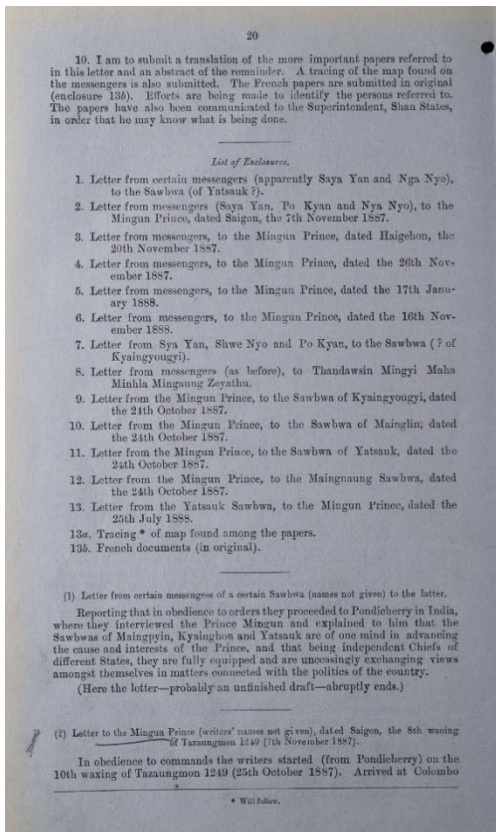
延伸至中国境内的铁路规划图
 'Schemes of railway extension into China. Prospects of trade with Yunnan and railway extension.' W Lee-Warner and E Neel, 11 & 19 Nov 1895. IOR/L/PS/18/B72/2.

过去的二十年间，历史学家的研究重心已经从民族国家转移到对全球和跨国进程与关联的探索上。通过单个国家开展历史研究的方法存在很多局限性。首先，在理解社会随时间变化的复杂性时，国家的范围有限且常常是人为的划定。目前常见的论点是，国家本身就是不断移动和不断变化的实体，其意义一直以来都是有争议和不稳定的。历史研究无法很好地限定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事务部档案提供了一套能够满足这一全新研究趋势的出色资料，突出了很多地区的历史，远远超出了英属印度的边境领土范围。这套档案揭示了现代国家边界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呈现出覆盖全世界的巨大国家关系网。

当印度政府和它的官员们从他们帝国的边境线上望向东北方时，中国赫然耸立。无论是清政府统治下、在十九世纪渐入困局的中国，还是二十世纪初新生的、国民党执政的中国，这里发生的事情也回响在印度次大陆上。该数字化文献典藏——“中国与现代社会：外交与政务密档，1869-1950年”(China and the Modern World:

Diplomacy and Political Secrets 1869-1950) 涉及中国与英属印度之间的关系，记录下帝国之间以及帝国与新生国家之间相互交织的历史。此外，一定程度上因为印度和中国的面积和地区实力，这套档案也包含涉及其他地方的资料。两个大国相邻的地区成为了外交紧张关系和冲突爆发的源头。住在南亚和东南亚高地地区无国籍的人们，频繁穿越国境并反抗任何企图将他们定居在一个国家境内的尝试，是帝国官僚机构扩张的眼中钉。在这些边境地区之外，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有大量的海外华人，与印度和中国都形成了内在的关联。再进一步拉远来看，中亚、东北亚和欧亚大陆上的国家和人们都与印度发生的大小事件息息相关，均在这套档案中有所体现。

摆脱了狭窄的国家框架束缚后，历史学家们利用这套数字化典藏将有机会在更大的范围内探索过去——从持续数十年的、政府高层之间的高端、官方政治互动，到被边缘化的个体的日常经历。在这套档案涵盖的时期内，一些全世界最具争议性的国境线逐渐形成。危险的探险远征、残酷的惩罚性突袭以及为划定边界而进行的痛苦的外交谈判，都被细致入微的记录下来。通过这些档案，我们可以追踪有或无法律制裁下货物和人员的流动。该档案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宏观的历史窗口，由此观察到印度次大陆上的英国帝国主义在重塑亚洲政治版图中发挥的作用。同时，这些印度事务部档案也记录下了很多个体的生活，或简短、或零散。有被废黜的王子指使他们的特使在英属印度边境上煽动叛乱，有部落首领的妻子为与英国官员达成协议牵线搭桥，有无政府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用世界语撰文宣传世界革命。该档案库详细记录下了个体与快速变化且不确定的环境达成一致的瞬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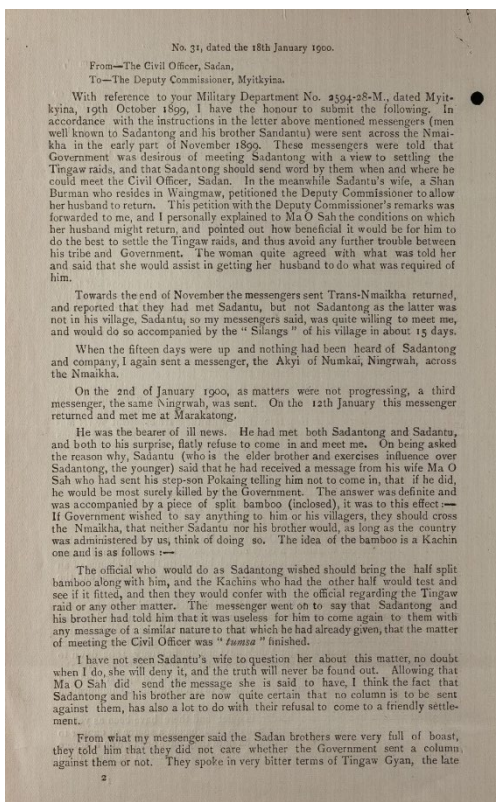


这样一套包罗万象的档案为好奇的历史学家们呈现了无数个可能的入口。让我们从 1888 年 12 月的马德拉斯 (Madras) 开始，这里有三名缅甸人被印度警察拦下。在被短暂扣留并且持有的文件被没收时，这三名旅行者刚刚抵达这座城市，并计划前往法属印度支那的飞地本地治里 (Pondicherry)。截获的文件表明，在缅甸、云南和安南交界的山区存在一个反英秘密网络，涉及中国清政府、法属印度支那、缅甸前王室和掸邦土司。这几个人持有的文件包括：法国护照和携带武器许可证，大量英国官员很难翻译的汉语和巴利语文件，法语和英语的中国地图，描述在缅甸、法属印度支那和印度旅行日程安排的文件，一些“不太能理解”的诗作，一些缅甸医药书籍，彩票，以及最重要的掸邦土司与“敏贡王子”之间的信件。敏贡王子是已被废黜的缅甸国王锡袍的长兄，后者在

马德拉斯警方截获的缅甸敏贡王子特使的文件
Correspondence on certain papers seized by the Madras Police from the emissaries of the Mingun Prince of Burma, Dec 1888-May 1889. IOR/L/PS/7/57 Sec.No59

1885 年至 1886 年第三次英缅战争英国吞并缅甸后被流放。这次短暂的战争之后缅甸各地起义四起，直至 1888 年仍未平息。几伙叛军集结在一起支持敏贡王子，这位王子拒绝向英国投降，最终得到了法国的庇护，先后居住在安南和本地治里。¹

英方截获文件中的多种语言证明了缅甸殖民地的跨国影响。被英国警方释放后，这三个人继续前往本地治里。英国情报部门证实，他们受雇于被流放的反叛王子。尽管这些文件内容混杂，但它们却引发了英方的焦虑。反对英国统治的几位掸邦土司的信件尤其令英方担忧。由于缅甸特别是掸邦持续不安定的局势，英方担心敏贡王子可能会在这块刚刚攫取的殖民地上造成巨大的破坏。信件的内容也很直白。在他的信中，王子提供了他对国际事务的分析，指出近期俄国、中国和法国的活动预示着英国的衰落。掸邦土司们在信件中宣誓他们坚定反对英国的立场。除了这些信件，分析这些文件的英国官员对其中似乎暗示清朝地方官员支持王子的中文文件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他们也不相信法国对搅乱局势有任何的兴趣和意图。但无论如何，这些文件的存在及其在王子特使间的流传表明这位反叛的被流放王室成员正在试图建立起更广泛的反英跨国联盟，以提高他的威望并团结残余的缅甸抵抗力量。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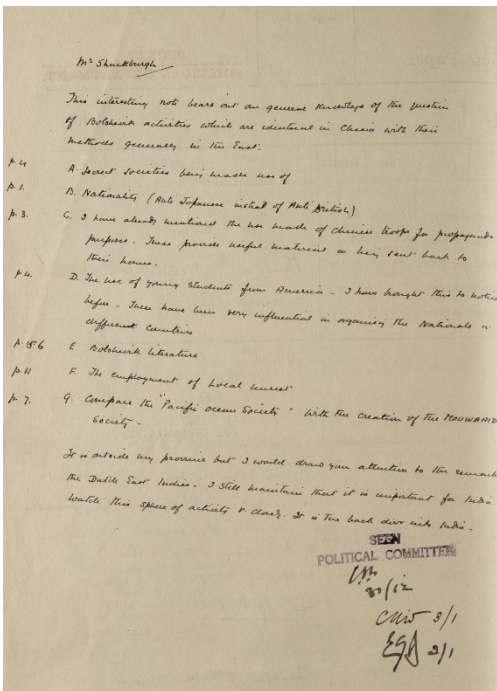


Burma-China frontier: feud between Sadan Kachins and the Jingaw villagers; settlement impossible without a punitive expedition. June 1900. IOR/L/PS/7/124/25 M no. 62-1

这是大英帝国扩张的一个瞬间，征服缅甸的一个小插曲。但该档案库却能让我们深入其中，探讨生活在缅甸与中国乱象丛生的边境上的人们的平凡经历。在这些边境地区任职的英国官员对他们权力的不堪一击感到焦虑。他们的焦虑折射在一些档案资料中，这些资料记录了他们维护殖民地领土边界的日常外交活动。例如，1900 年被派往殖民地最北端、缅甸与中国接壤的克钦邦的行政官员，请求远征讨伐英国管辖范围之外的一座克钦村庄。他一直尝试为两座交战中的村庄找到友好解决方案，但最终导致了他们对英国领土的袭击。他担心，如果他不能展示一些惩罚手段，他在边境线英国一侧同胞面前的威信假象将会被戳破。为了达成一项协议，他与一位克钦土司的妻子 Ma O Sah 谈话，希望她劝说她的丈夫与自己进行一次私下的会面。结果，她的做法恰恰相反，她告诉她的丈夫如果他和这位官员会面就会被杀死。最终，这位土司拒绝与英国官员会面，并给了他半片竹子。竹片是他们与缅甸政府代表会面的条件。他们不会前往政府官员驻地，官员必须离开英国领土，带着半片竹子前来见他们。如果两个半片竹子相吻合，他们才会与官员做下一步的商讨。³

对于这位官员而言，这个条件是无法接受的，他请求批准惩罚他们，因为他们正变得“狂妄自大”。他在印度行政部门的同事们认为，中国势力在这一地区的扩张和强化助

长了这些顽抗村民的气焰，让他们敢于蔑视英国的代表。但与此同时，政府希望改善与云南边境上中国官员的外交关系，以促进陆路贸易。印度政府试图平衡这些来自不同方面的压力。他们同意，如果事态恶化，惩罚性的突袭将会获准。但他们也对这类行动给予了明确的指示，在公函的最后说：“但我们相信，这种必要性不会出现。”最终这当然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插曲，但它对历史学家而言是一个生动的案例。它打开了一个窗口，可用以研究英国驻缅甸官员与他们边境之外高地族群之间非正式外交的裙带路线。它记录了如何开展这种低端外交沟通的一些民族志细节。它也暗示出随着英国和清政府在这一地区势力的逐渐巩固，各方权力平衡的不断变化。^{IV}



进入二十世纪，对帝国边境以及跨边境叛乱人员的焦虑仍在持续，但出现了新的人物。例如，该档案库也包含英国情报机构收集的文件，涉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革命运动和活动。情报收集行动的迫切性出于对苏联向中国、继而向东南亚和印度输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担忧，尽管他们现有的知识表明，激进政治意识形态更多地是土生土长的，而不是从外国引进的。20世纪20年代发布的两项报告对重要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活动人士的生活和活动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描述。他们最关注的人之一是李泽洛维奇（Jack Lizerovitch），他受雇于著名的贸易公司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李泽洛维奇活跃于上海，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紧密合作，被视为是一名高效的宣传者和招募者，与居住在伦敦东区的英国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关系令人担忧。他创办了共产主义报纸《上海生活》（Shanghai Life）。

^{IV} 'Bolshevism, Chinese communism and anarchism in the Far East'. IOR/L/PS/11/183, P 8706/1920

李泽洛维奇代表了英国跨国监视中国沿海城市激进活动网络的范围。这些网络汇集了朝鲜、日本、马来亚和印度的激进人士。其中一位中国活动人士刘师复被称为“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他是著名的中国激进人士之一，1907年在巴黎开始积极活动。将刘师复与苏联共产党在中国的活动连接在一起的是世界语。这些报告警告说，这种语言是互助合作的源头，一种“共同的纽带”。刘师复显然是世界语的热心倡导者，他的杂志《Evolucio》就是用这种语言出版的。为《上海生活》撰稿的一位苏联共产党员甚至创建了一所世界语学校。^V

这三个小的案例——敏贡王子的图谋、克钦村庄的挑衅和世界语者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网络，似乎看来是毫无关联、相互孤立的历史插曲，从很多角度看的确如此。但从更抽象的角度，它们都是与更大范围内不断变换的跨国地缘政治背景相关联的局地活动，因此都被视作对英国统治印度造成了威胁。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往往会在印度引发激烈的反应。因此该档案库中数字化的印度事务部档案为历史学家们提供了更广泛

的、可供探索的话题。而且，该档案库中丰富的细节帮助学者重建一定范围内的历史，恰好聚焦在这些历史参与者的生活经历上。

参考文献：

- i. Correspondence on certain papers seized by the Madras Police from the emissaries of the Mingun Prince of Burma, Dec 1888-May 1889. IOR/L/PS/7/57 Sec.No59.
- ii. Ibid.
- iii. Burma-China frontier: feud between Sadan Kachins and the Jingaw villagers; settlement impossible without a punitive expedition. IOR/L/PS/7/124-25M no.62.
- iv. Ibid.
- v. Bolshevism, Chinese communism and anarchism in the Far East. IOR/L/PS/11/183-P8706 1920.

引文：

Jonathan Saha, 'China in the India Office Records', China and the Modern World: Diplomacy and Political Secrets 1869-1950, Cengage Learning (EMEA) Ltd, 2019